

萧玉田：环首都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李士祥：北京市区房价肯定要降下来

■ 韩旭 文静 报道

近日，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士祥就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三地协同发展交通仍是核心

记者：近年来，各界一直盼望京津冀协同发展能得到中央层面的统一部署，目前有什么进展？

李士祥：这次总书记讲，京津冀要放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来考虑这个事，我们耳目一新、打开思路。京津冀协同发展，这就要看怎么理解首都功能，首都功能不是北京功能，是国家功能。

记者：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中，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李士祥：核心的问题还是交通问题。像城铁，北京到天津半个小时就解决了，有的住在北京郊区进来都不可能这么快。

记者：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方案进展如何？

李士祥：我们正在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首先是功能的规划，三地要统筹研究；第二是交通问题；第三个是环境治理。国家发改委也正在研究这个规划，并已征求了若干次意见了，很快就要出台。然后，就是要落实总书记要求，找到三地结合点，这不是原来层面的转移和纾解，而是构成京津冀甚至是环渤海范围的大布局。

北京房价回归合理应有信心

记者：就京津冀而言，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空气污染问题，协同发展的规划中，有何具体举措？

李士祥：首先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比如调煤。到2017年，北京要把现在2300万吨燃煤再压减1300万吨。第二，要控车，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让很多人有车但可以不开车。还有，是工业调整，有一些要转产，要转走，有一些要通过技术改造，减少直排和污染。

记者：非首都核心功能要纾解，都会涉及哪些领域？

李士祥：这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比如批发市场、物流。过去，这些产业起到了供给、就业、促进税收的作用，但现在人口聚集、交通拥堵，他们自己也觉得不方便了，成本高了。像这些都可以按照首都经济圈的思维，把基础环境创造好，让企业选择，我们反对单纯行政思维，一定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

记者：有消息说，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北京的房价会下跌，周边的房价会涨起来，您怎么看？

李士祥：北京市区的房价肯定要下降，一是我们的供应量加大了，特别是保障性住房。二是我们的房地产结构发生变化，房价肯定要下来。

河北、燕郊房价不是会上升？这个也没有普遍性的结论。比如将来北京有些功能纾解出去了，就没有必要在那儿买房了，功能纾解出去了，就可以在河北住，在河北上班了。整体来说，随着政府扩大保障性住房的供给，房价会回到一个合理的理性空间，应该是有这个信心的。

保障房市场化今年或将见效

记者：政府工作报告中77次提到改革，北京将怎么落实深化改革？

李士祥：按照三中全会精神，北京成立了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也通过市委四次全会讨论出台了改革的决定，重点来说，第一是转变政府职能，比如说，最显著的是基本建设的投资，原来是审批需要300个工作日，现在是109个。第二，我们也正在研究便民的审批流程，审批的项目所有都要公示，要做出承诺，接受监督，有一些还可以网上审批。

对于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国有企业改革。还要解决品牌问题，北京生产型服务业发展还是好的，但生活型服务业品牌还不够。北京需求是多样的，多层次的，有高端、中端、低端的，怎样提高生活型服务业的品质，是我们下一步改革方向。一些品牌，需要通过改革来培育。

还有就是调整投融资体制，目前，市场的活力还没有被完全激发起来。比如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厂、地铁、包括保障性住房，完全都可以社会资本进入，政府把标准设计好就可以了，要加强监管。

记者：您提到的这些领域都可以实现市场化？什么时候出台？

李士祥：都可以市场化，已经在制定细则了，预计今年就会见到效果。



为北京和天津输送清洁的空气，不但过滤空气还输送清洁的水源，承德离北京很近，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京津冀是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化一脉。承德离北京是最近的，承德一些地区甚至是和北京市直接接壤的。正是由于我们发挥了坚实的生态屏障作用，对北京、天津的生产生活乃至生存、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主持人：那像承德这样的城市怎么样去处理好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好像就尤为重要的，您是怎么看的呢？

萧玉田：所以我为什么在这次全国人大中提出要设立环首都生态文明和社会发展特区，并把它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空间的建议呢？我的核心思想就是不能让为生态文明建设做出贡献的人民受穷，而是要让他们富起来，我们要实现生态增绿和百姓致富的双重目标。

主持人：那在这个特区内要解决好什么样的问题呢？就像您说的怎么能够让为我们生态保护做出贡献和牺牲的人富起来？

萧玉田：设立这个特区，我觉得应该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为目标，明确生态红线，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生产模式等手段，大力开展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不断提高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在为首都提供更好、更强、更大的生态服务的同时，着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打造京津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水源保护区、文化旅游胜地与京津地区休闲度假目的地，京津地区产业转移重要承接地，实现科学发展、绿色崛起。

绿色崛起是我们承德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一个目标。我们要建立完善的生态文明体制和机制，促进经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协调，探索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共赢之路。我想应该要达到以下目标，我和我们承德市的党政领导以及一些职能部门进行了充分的沟通，生态建设要取得显著的成效。我最近没有去张家口搞调研，对承德的情况比较熟悉。承德的目标是水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为京津新增供水10亿立方以上。

说起来，京津冀都是缺水地区，承德也不例外，但是在京津冀全区域来看，承德的水量仍然是充沛的。每年它为京津两个大都市提供的水资源是294亿立方米，这个量是很大的，虽然为了要更充分、更好地解决京津缺水问题国家实施了南水北调的重大工程。但是承德这个水可以说是输送的里程最短，而且我们对水质的保护又做到了最好，那么在这么短的流程中把水送进北京，应该说对它水质的保护可以说是做到了最好，另外相对来讲成本也是最低的。另外城镇生活污水的集中处理率和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要分别达到百分之百，农村的环境要得到有效的改善，工业污染方面要取得明显成效，同时要确保空气质量，做到全国领先，力争全年二级以上天气稳定在350天左右。

因为我现在工作在北京，每年80%的时间在北京，所以非常渴望回到那个天蓝、水清、山绿的承德去，承德提出每年二级以上天气保证并且稳定在350天，这是一个很宏伟的目标，我想承德有能力、有决心能做到。森林覆盖率提高到60%以上，现在已经是华北区域覆盖率最高的城市了，我们还要继续提高它的覆盖率。森林的质量也要不断地提高，森林碳汇能力要进一步增强，城市公用绿地面积要不断扩大。

另外我们要建立一个绿色的产业体系，高效的生态农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工业以及现代服务业要居于主导地位

位。承德由于我们砍掉了很多会对环境造成伤害或者是过度消耗资源的企业，虽然它现在经济发展的滞后，成为贫困带，但是反过来说，它也成了我们探索新的发展方式的，具有后发优势的地区。

在这个地区设立生态文明和经济协调发展特区具有这么一个后天的优势，所以我们在该地区设立特区，如果实现在保证生态优良的前提下做到经济发展、人民富裕，那么我们就为全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树立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示范区。我想这也是很有意义的。

主持人：我相信网友听您讲到这里会有一个很感兴趣的话题，就是您作为著名的画家为网友所熟知。那什么时候开始对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兴趣，又是什么事让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如此关注的呢？

萧玉田：正因为我是画家，我经常深入农村写生，承德刚才我谈到了，天蓝、水清、山绿，承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有避暑山庄这个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遗产，同时它的山也美、水也美，我经常深入到农村去写生，这也就跟农村农民、基层干部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在感叹承德山绿、水清、天蓝，有如此优美环境的同时，我也亲眼目睹了承德人民的贫困。等我2003年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之后，又因为履职的需要，我经常深入到各县区去调研，更深层地了解了承德之所以贫困的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令人震惊的。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承德百姓的贫困，承德地区致贫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它是京津的上风上水地，又是水源地，还是阻挡风沙地，那么它承担着巨大的生态屏障的责任。为了确保水质的清洁，确保空气的清新，承德在经济上做了很大的牺牲。国家还有京津两个大都市，对承德生态保护的要求越来越多，限制越来越严。但是在“十五”之前，对承德的支持远远不够，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60年代由于国防建设的需要，承德被列为军事禁区，那会儿就开始不上工业项目，不搞基础设施建设，承德说起来是清王朝的第二个政治文化中心，换句话说就是清王朝的夏宫，清朝皇帝康熙夏季是在承德生活的，是当时的富裕地区，建国后承德也相对经济发达，当时它的经济发展程度好于北京的远郊区，60年代由于国防建设的需要列为军事禁区开始，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承德没有获准开放，承德获准开放最晚的县到1998年，改革开放滞后二十年，错过了很多发展机遇，这也造成了承德的经济发展速度渐缓，形成了和京津包括远郊县的巨大落差，还有一点就是京津两个大都市，相当长时间内对承德和张家口的吸附大于辐射。用承德百姓的话来讲是造成了“大树底下不长草”的特殊现状。

主持人：那您调研时了解到承德老百姓的生存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从而触动了您呢？

萧玉田：2006年我曾经到朱镕基总理和温家宝总理都去过的丰宁县的小坝子乡，那里的农民和我们有过对话：现在能吃上肉吗？农民回答：能。多吗？他说：一年一两回，每年割上一两斤肉。豆腐呢？回答：能，买一块豆腐分成三次吃，住的房子冬透风，夏漏雨。这两个地方两位总理都去过，他们也亲眼见过。

所以在2007年我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总理很动感情，总理回忆他去承德，在滦河走，看到滦河的水很清，但是他走访的农户又很穷，对离首都这么近的地方，却有这么贫困的农民，有这么贫困的地区存在，也感到了确实到了应该解决的时候。

所以正是因为对承德人民的奉献我看

在眼里，对承德人民因此所受到的贫困，我又感同身受，当时京津冀的领导也都在关注着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的问题，我想我应该就这个问题根据我的调研、根据我的所思所想，履行好代表职责。一个是要把党的关怀传递给群众，再有一个就是要把老百姓的呼声向上传达，所以就围绕这个专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的调研，形成了多份建议。

随之而来的就是关于生态补偿的问题，也成了我履职的一个关注重点。当然，这些年我关于文化方面的建议也有，但是更多的是围绕着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和生态补偿这个问题来展开。也有的建议被国家发改委等部委列为重点建议去办理，应该说是取得了很大的实效吧。从“十一五”开始，“十二五”应该说国家各部委，包括京津两个大都市，对承德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承德老百姓的生存状态，生产生活条件都在逐年地改善。但是我觉得这个力度还要加强，所以这次又提出建立生态文明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特区，我觉得主要就是加大解决力度。

刚才我说了一个短板，那么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一体化发展，不解决好这个短板就很难做到协同发展。我觉得总书记提出的“协同”，我们过去说“协调发展”，现在叫“协同发展”，我自己的理解意义非常深，一字之改说明了总书记的高屋建瓴。协同既有协调的含义在内，同时也有互利共赢同步发展的含义。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京津冀党政领导也做了一个很庄重、很庄严的表态，就是我们要打破区域观点，走出我们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从京津冀整体发展、协同发展、一体化发展角度去考虑问题。我们北京的领导、天津的领导、河北的领导，包括我们全区域上下都在认真地、深入地学习研究理解总书记的这一重大指示，科学地谋划怎么样落实好这个重大的国家战略。

所以我的这个建议是作为它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个重大的国家战略空间去考量，所以也希望一个是国家要批准设立这个特区，划定这个特区的范围，同时在财政政策、投资政策，乃至项目安排上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

咱们国家有上世纪80年代设立深圳、珠海等四个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又有90年代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布局，也取得了成功的经验，那么我想设立特区既有先例可寻，又有经验可借鉴。再加上这个地区张家口也好、承德也好，包括我刚才谈到的太行山区也好，又具有环首都的特殊区位，这个区位是全国独一无二、特殊的区位，是其他地区不存在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设立特区有不可比拟性和不可攀比性。

另外，咱们国家作为第二大经济体，首都周边正在这么一个“塌陷区域”，或者说“贫困带”，如果把首都比做太阳的话，那这周边的贫困带就等于给太阳围上了黑圈，形成“日环食”现象，这在世界上特别是发达国家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解决好这个问题，消除塌陷区域现象有助于提升首都乃至国家的形象。

主持人：那您为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呼吁了这么多年，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萧玉田：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让环首都周边的贫困地区富裕起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前提条件是保证生态优良，真正地做到生态增绿和百姓富裕，让环首都周边的人民，在奔小康的路上不掉队，说句更具体点儿的，到2020年和全国人民一道实现收入倍增。

主持人：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萧玉田：感谢您，也谢谢各位网友。

(新华网)

